

香港與廣東經濟 的再整合

●傅高義

香港對廣東發展的作用

中國，尤其廣東，到底怎樣控制社會向新政治經濟潮流開放的進程？這是我們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之一。對許多旁觀者來說，答案似乎很簡單：「就開放市場嘛！」但是開放的過程會引起新的危險，產生新的恐懼。

在中國，許多人深知商品短缺，所以特別害怕出現大型通貨膨脹。由於中國人口眾多，所以官員擔心價格控制取消得太快的話，通貨膨脹就會失控，從而出現40年代後期那種把國民黨趕出大陸的政治動亂。很多領導人認為，高漲的價格和過分急速放鬆政治控制是天安門事件的肇因。東歐的鉅變，也使他們擔心民主走得太快，將更難實現控制。同時也有人擔心如果市場開放過速，本已短缺的資源會從較重要的優先項目流失。

一般人都認為中國只致力於經濟改革而沒有致力於政治改革。如果與

開放的民主社會相比較，中國似乎還沒有進行重大的政治改革。但是，如果你考慮一下在政治方面是否發生過某些真正意義重大的變化這一問題的話，那麼，答案是：發生過。中國要求較年輕的政治領導人應獲得最低限度的文憑，才得以提升。儘管這種做法也許助長了文憑主義，但這仍然是領導性質方面的重大的變化。另外，在勞動關係的領域裏，在允許機構解雇和開除人方面，都作出了努力。這都是些重大的變化，當然也伴隨着所有產生的問題。

那麼，在所有這些發展中，香港起了甚麼樣的作用呢？讓我們試着從十年改革的廣東這一角度，來看看香港。來自香港的最具威力的一種早期影響，只是那些觀光客把消費品帶給廣東的親戚。1973年，我第一次到廣東時，問及當地人擁有電視、冰箱的情況，很多人竟然說：「我們對這些東西不感興趣，……，它們在香港可能是必須的，但對我們來說沒有必

如果與開放的民主社會相比較，中國似乎還沒有進行重大的政治改革。但是，如果你考慮一下在政治方面是否發生過某些真正意義重大的變化這一問題的話，那麼，答案是：發生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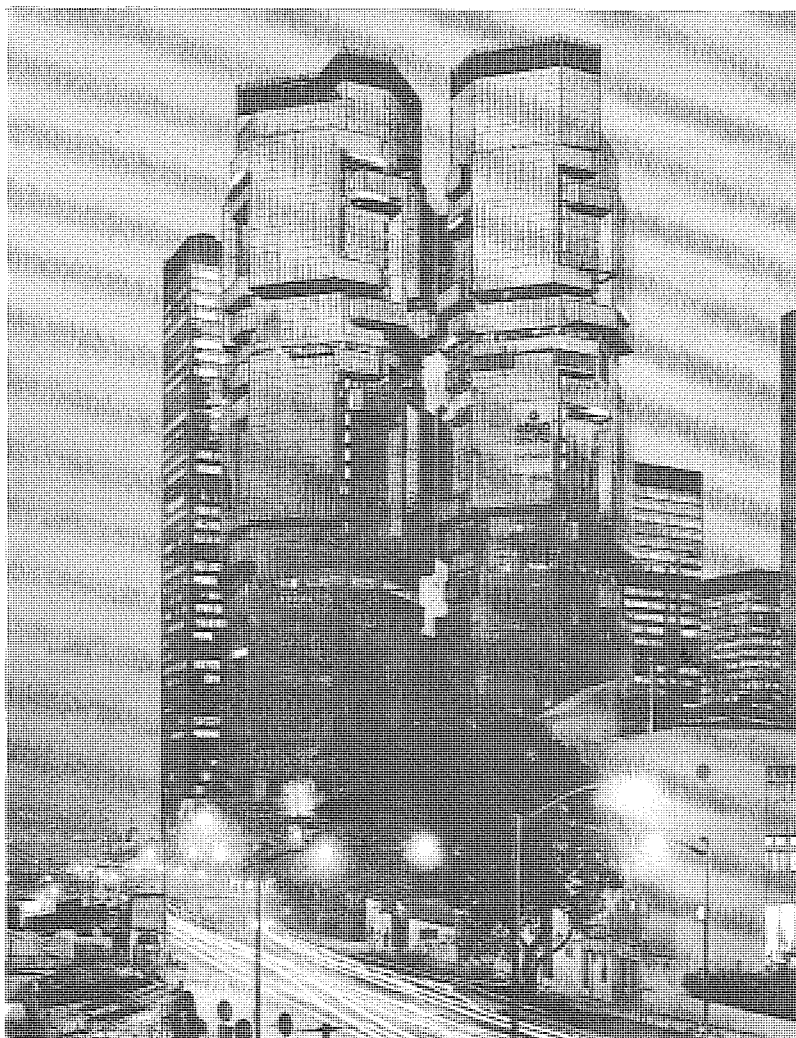


圖 來自香港的新技術和新資金幫助啟動了強大的、新的活力，而比這些貢獻更為重要的可能是引進了基本的、新的思維方式。

要。」我們都傾向於認為，現在的廣東充斥着一種消費主義。但是，在改革以前，在廣東的很多圈子裏，人們大都安於他們的生活。因為，他們幾乎沒有改變的希望。他們也沒功夫去追求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很多人虔誠地相信，與生活在充滿犯罪、自私和揮霍的香港人比起來，他們有一種優越的道德生活。但是，當親戚們開始帶些禮物進來時，馬上就刺激了人們的物質慾望。尤其是在那些能夠接收到香港電視的地區，更是如此。

80年代初，那些在香港有富裕的親戚的人總夢想他們可以不勞動就過上好日子，那就是想方設法慫恿親戚和朋友帶那些商品來。然而，隨後幾

年，隨着獲取這些東西的慾望變得越來越強，很多人開始看到，要是找到新的工作機會，他們自己也買得起這些東西。1982年到1983年，巨大的機會出現了，他們開始找新工作，開始存錢，並且買更多消費品。

香港起作用的另一方式是，當中國政府開始考慮廣東發展戰略時，他們決定設法吸引香港的資本和技術。為了得到香港生意人的合作，政府首先不得不為港商們在廣東的受迫害的親戚平反。他們不得不到許多城鎮和農村去。從前他們在那裏從僑屬手裏沒收了財產，現在物歸原主。

為了努力使中國對香港的投資有更大的吸引力，也要求更快地為觀光

客和旅遊者擴大便利。十年前，東方賓館是唯一一家現代賓館，你們當中要是還有人能記得當時想從廣東打電話到香港的情況的話，那他也能感到變化的廣度和速度。

來自香港的新技術和新資金幫助啟動了強大的新的活力。但是，比這些貢獻更為重要的可能還是引進了基本的新的思維方式。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當廣東還相對封閉的時候，他們一直認為香港是一個充滿自私自利、不道德的人的地方。但是，一旦開始大範圍的接觸，對香港實際上所進行的一切，廣東人得到了一個有關香港現狀的更為豐富和更為準確的圖像。新的觀念和新的自由感開始萌發，新的看法和新的思維方式比起技術和資本的流入或許更為重要。

80年代初的巨大突破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中國的改革與香港的經濟變化恰恰相吻合。改革只是打開大門，使從前不可能的事情變得可能。但是要使這些事情發生，就需要人力和機構，計劃和實施。香港—廣東關係時逢好運，因為香港的經濟變化和廣東的改革開放如此美妙地相互一致。二戰以後，香港的中小工業在40年代末期迅速成長起來，對香港的復興一直有着極大的幫助。尤其是1951年，當時香港切斷了與大陸的來往，轉口貿易沒有了。80年代初期，由於香港的生活和工資標準大幅度上升，這些中小企業中有許多確實處在倒閉的危機之中。幸運的是，正在這個時候，廣東開始開放，利用邊界那邊的廉價而熱情的勞動力的機會來了。這是一種富有活力的聯合，它為80年代中後期在廣東出現的經濟大起飛提供了經濟基礎。

80年代初，上天恩賜給廣東一個

非同一般的好領導。那就是1980年至1985年任省委書記的任仲夷，廣東政府裏的人一般都認為，在指導本省的發展方面，他是最傑出的人物。在遼寧時，他就是一個心懷寬廣而又具有豐富經驗的官員，受到了北京領導人的信任，他們允許他在進行局部的改革時有某種靈活性，因此，才使80年代中後期的活力得以可能。其他的官員如佛山的于飛，也很快起來利用新機會。

深圳經驗

深圳和珠海這兩個經濟特區的改革效果完全不同。深圳發展最為迅速，其他的三個特區，珠海、汕頭和廈門則相形見绌了。深圳之所以能成功，得益於新制度和來自北京的巨額投資。然而，廣東許多有見識的領導人認為深圳不值得如此驕傲。他們認為如果你從北京接受了幾億美元，而且有國內最好的建築師，又有辦法與香港的資金和企業家溝通，那麼，對深圳的繁榮來說，就沒有甚麼絕竅可言了。

深圳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來自中國各地方的公司都來投資，特別是那些60年代初，由於考慮到國家的安全，有些企業被迫從沿海地區遷往中國內地的「三線」企業。這些公司從前為軍隊生產收音機，現在可以開始為出口來生產收音機了。這些公司在深圳的起步中起了關鍵的作用。

深圳開始時的希望是促進國際高技術的轉讓，他們夢想，中國通過開放深圳，制定正確的法律和商業規則，外國人會努力投資現代技術，中國其他的地方就可以到深圳來學習這

80年代初的巨大突破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中國的改革與香港的經濟變化恰恰相吻合。一種富有活力的聯合，為80年代中後期在廣東出現的經濟大起飛提供了經濟基礎。



圖 深圳經濟特區發展最為迅速。它之所以能成功，得益於新制度和來自北京的巨額投資。

種新技術。令北京的決策者們失望的是，僅僅這麼做並不足以吸引擁有最新技術的外國投資者，因為深圳缺乏有才能的合夥經營者來充分地利用這種高技術的投資。就這一點來說，條件是不成熟的。但是，對於香港的那些想利用熱情高而價廉的勞動力來建立加工廠的小企業來說，這些條件就足矣了。深圳的有些官員努力勇敢地剷除官僚主義，但是，他們還是比不上珠江三角洲那些小縣城裏躍躍欲試的官員們。

這些縣裏的大多數，像東莞、寶安、中山、南海、順德，以及更近一些時來還有番禺等縣的地方官在利用香港的加工投資方面有更大優勢。他們說廣東話，他們更容易統一，很少在管轄範圍上發生爭執；他們能行動得更快，也不那麼官僚，他們的工人也願意接受較低的工資。他們有點外行，只有點兒有限的經驗，這些縣還有點土氣，但是他們有熱情。這些縣並不像深圳那樣去發展基礎設施以吸引巨額投資，但是就真正的活力和熱情而言，他們則大大超過了深圳。廣

東省裏的領導有這樣的一個印象：這些小縣雖沒有巨額投入，但是，他們卻把事情辦成了。

政治忠誠與經濟緊縮

現在讓我來簡要地講講最近三年有關廣東／香港地區的主要變化的最重要的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與對天安門事件的政治反映有關。第二個問題就是1988年開始的經濟緊縮。第三個問題是內部產生的新發展。第四個問題是沿海地區和內地省份之間的關係。

首先，基於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政治情況，廣東的基本精神是：「我們不要讓北京的這些運動妨礙到世界上真正的重要事情，這事情，當然，就是基本的經濟發展。」

廣東的官員注意不公開地妨礙北京，當北京發出命令說要開一些會來批評一些事情，廣東也做些批評動作。北京說要嚴懲那些參與走私的人，廣東就嚴懲他們；北京說要處死

深圳的有些官員努力勇敢地剷除官僚主義，但是，他們還是比不上珠江三角洲那些小縣城裏躍躍欲試的官員們。這些小縣雖沒有巨額投入，但是，他們卻把事情辦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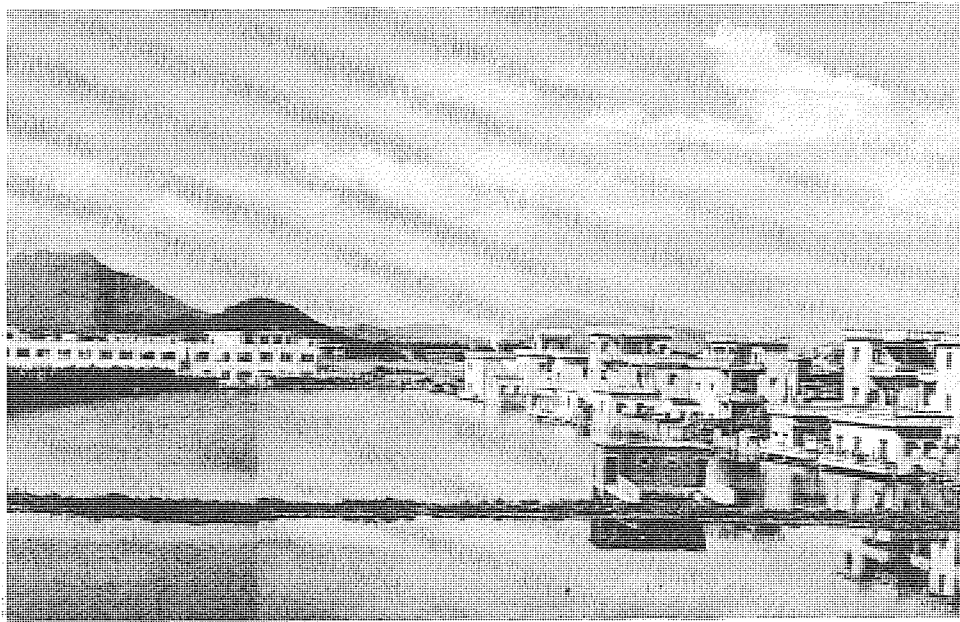


圖 東莞、順德等縣不像深圳那樣去發展基礎設施以吸引巨額投資，但是就真正的活力和熱情而言，他們則大大超過了深圳。

一批走私犯，廣東也遵從了。在不妨礙北京，不向北京的權威挑戰的同時，廣東省的領導基本上做他們自己的事，而北京也沒有多大的干預。實行緊縮政策就是一個例子。1988年，北京要求廣東關閉大量的當地鄉鎮企業。企業的確是按照北京的命令關閉了。但是，北京並沒有說作為其他企業的一部分的新的企業第二天不能開門，也沒有說某些新的企業不能開張，因此，同樣是這些人在其後的幾天又都工作了，只不過是為不同的企業，在不同的名稱下，做着他們從前所做的同樣的事情，重要的是並沒有與北京的領導對抗。這是廣東所遵從的一個基本戰略。從根本上來說，在北京的最重要的需要——即保持他們的政治的權威和徵得更多的稅收，與廣東的需要——即保持本省經濟向前發展，之間要有一種平衡。

最近兩三年的第二個大問題是經濟緊縮問題。1988年，北京就開始對經濟過熱進行控制，放慢投資，更好地控制物價和通貨膨脹，控制預算和消費的基本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緊縮政策的影響下，生產耐久商品（諸如洗衣機、電飯煲、電視機、收音機等商品）的廠家，以及在中國有國內市場的工廠發現，越來越多的人無錢購買他們的產品。總而言之，緊縮所產生的影響是：人們之所以寄希望於市場經濟，是因為宏觀經濟政策控制了消費。

然而，北京也使用一些政治手段來抑制經濟。他們要求廣東的官員使用政治學習組織和政治壓力來實現緊縮。正如一位廣東官員不無諷刺地對我說的那樣：「我們對搞政治運動很在行，要是本單位有人買了一個高檔的大冰箱，他們就會問：你的錢是從哪兒來的？」而通過使用「政治壓力」，他們削減了某些公司原有的市場機會，影響就大了。

同時，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廣東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對將來的成功可能非常重要。由於國內缺乏市場，他們就更多地轉向出口。1987年，我在廣東呆了七個月，那時我開始擔心廣東是否能夠發展到如同使四小龍騰飛的那種質量和效率的標準。到1988年

在不妨礙北京，不向北京的權威挑戰的同時，廣東省的領導基本上做他們自己的事，而北京也沒有多大的干預。

為止，對消費者來說廣東耐用消費品的質量和效率遠遠落後於四小龍。通過從香港引進一點新技術和新觀念，那些小工廠能夠生產出在中國暢銷的產品。因為，比起中國的競爭者來，他們的產品要強得多。可仍然沒有達到國際市場的標準。然而，由於1988年的緊縮，廣東的這些公司被迫更多地從出口着眼，這就迫使他們提高質量標準，提高效率。提高標準意味着：當其他的公司提高了效率時，一些小的鄉鎮企業就被甩到了後邊。

舉電扇為例，若考慮市場能力，它是最有吸引力的產品之一。1988年，珠江三角洲有很多小城鎮都在生產電扇，隨之像順德這樣的地方出現了一個大型工廠。他們的效率很高，年產電扇幾百萬臺。不能與之競爭的一些小工廠就關閉了。但是，由於它是鄉鎮企業（這是在廣東興起的許多經濟企業的一種饒有興趣的特徵），他們要保持同一就業水平，所以就轉向其他的產品。在經濟領域，省領導的新職能之一就是努力通知當地的企業，市場的機會是甚麼，以及外地正在建哪些工廠，這樣他們就知道了競爭的情況。總之，在國內市場減少的情況下，緊縮使這些公司認識到他們的業務應該面向世界範圍的市場行情進行調整。對於國內市場而言，他們在家庭耐用品如冰箱、電視等方面開始做得較好，對於出口市場，他們更多地發展紡織品、服裝和低水平的電子產品。為了符合出口的要求，最近兩年開始改變產品的搭配。這種趨勢還在繼續。1990年廣東的出口大幅度地提高，這一年工業增長率約百分之十七。儘管沒有像前幾年那樣成倍地增長，這增長率依然是很大的。增長率之所以這麼大，就是因為廣東的企

業已經在出口市場方面取得了成功。

內部的持續發展

變化的第三個方面是由於國內的發展，尤其是不斷進行的結構改革。例如，在價格改革、住房改革、金融市場改革等方面，廣東現在都有新的推進。如果廣東有更大的自主權的話，他們在這些方面也許會走得更遠。

城市住房也是大問題之一，住房絕大部分一直是由工作單位所控制，工作單位按低於成本的價格提供住房給職工，但是人們的工資還是不足以購買住房。現在我們注意到朝着發展私人住宅市場的新轉變。單位或是給錢或是借錢給個人。朝私人住宅市場方面的新轉變可能要花費幾十年才能完成，但是它是廣東的一個具有極重要性的發展。

近幾年，在深圳開放了股票市場，它開始了一個緩慢的起步。因為廣東的存款非常高，所以我認為隨後的幾年，股票市場還不會真正成為大的籌資來源。十年以後，廣東的股票市場才開始重大的發展，深圳和上海也一樣。這是繼續改革的另一個領域。

廣東的領導們已經在考慮，在其後的十年，他們應該做些甚麼才能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他們很擔心來自上海和其他大地方的競爭，中央現在正幫助上海建設浦東。廣東的一些戰略決策者相信，在隨後的幾年，重工業的發展將會變得更重要。因此，廣東要想繼續作為充滿活力的經濟中心，它就不能像第一個改革的十年那樣只是依靠消費品工業，而將必須發

在國內市場減少的情況下，緊縮使這些公司認識到他們的業務應該面向世界範圍的市場行情進行調整。1990年廣東工業增長率之所以這麼大，就是因為廣東的企業已經在出口市場方面取得了成功。

廣東要想繼續作為充滿活力的經濟中心，它就不能像第一個改革的十年那樣只是依靠消費品工業，而將必須發展重工業。由於在這方面中央政府不會給他們較大的幫助，所以他們就不得不找新的途徑來獲取外資，使發展重工業成為可能。

展重工業。由於在這方面中央政府不會給他們較大的幫助，所以他們就不得不找新的途徑來獲取外資，使發展重工業成為可能。

惠陽的熊貓汽車廠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他們廉價購買通用汽車公司的舊生產機械，用它們來生產私人小汽車。我曾聽說有人推斷，除了尋找國外市場以外，現在這些汽車早晚有希望找到國內市場。目前，蜆殼牌石油公司也正計劃打進惠陽，這樣一來廣東的某地區很可能變成將來發展的中心。這就是深圳正東的惠州地區。從這裏乘快艇到香港不到一個小時。惠州市距汽車廠和蜆殼牌工廠的位置不到一個小時，其工業資產正在上升。換句話說，當它的工業擴張超過東莞時，從邏輯上看，下一個發展的地區就是惠陽——一個真正的大地區。

廣東西部如湛江等地也可能發展起來，因為三水和茂名之間的鐵路現已完工，這就開放了西部廣東。作為一個港口和鐵路樞紐，湛江可能會成為西南中國的大門。一旦越南開放了，這也是今後兩三年的事，就會刺激廣東西部和越南之間的貿易。

國內有長足發展的另一個領域是服務行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旅遊和娛樂活動的發展，而且還有醫療護理的發展，大家都知道，有些香港人已經到廣東去開業了，因為他們希望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引進較好的康復護理。也有人在設想，計算機軟件工作方面的人也能在廣東找到廉價的勞動力。我曾聽說香港的圖書館把分目工作送到廣州，因為那裏的勞動力便宜。另一個潛在的服務領域——印刷，也在廣東發展了起來。很多人不太注意廣東的服務行業，我們可以預

料，將來會有相當大的發展。

省際關係

第四個具有重大發展的方面是，近幾年廣東與中國國內的其他省的關係。從政治上講，這方面可能會變成一個敏感的領域。鄧小平與毛澤東關於沿海和內地省份之間的關係問題的看法不同。毛的想法是，藉着把沿海的資源輸送到內陸其他省份來發展中國內地。鄧小平卻認為，為了推動國家向前發展，應該允許本來就優越的沿海地區先發展一步。

然而，與內地省份之間還有一個相當大的政治問題，這就是所謂「紅眼病」，嫉妒廣東。在國內的其他地方，這是一種很大的勢力。一些小地方，如台灣、南朝鮮，出現某些不平衡很快就能妥善解決。而中國就不會發生這麼快的變化。它依然是個大而窮的國度，而貧窮的內地省份將有政治影響。廣東正日益努力解決嫉妒的問題，但這是個非常困難的問題。80年代初，有些其他省的人設置路障阻止運輸的貨物進入廣東，他們還惱恨廣東那些購買這些東西的「無賴」。那時他們還不知道，這對他們自己的省也有好處，也不知道向其他的省出口產品。然而，現在這些鄰近的省份日益認識到他們如何能夠從廣東的活力中獲取好處。湖南和廣西的省領導們也知道向廣東出售產品他們就可以獲利。

廣東與其他省份的商業關係也在日益成熟。這些省份號召廣東在他們那裏作更大的投資。這樣假如廣東需要更多的電力時，就可以從廣西得到水電了。這樣做，廣東和香港就會不

然而，與內地省份之間還有一個相當大的政治問題，這就是所謂「紅眼病」，嫉妒廣東。

得不給廣西的水電工廠投資，這些工廠就會轉而供電給廣東。省際聯繫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類似於山西電廠和深圳之間的那種關係，在廣東與那些從廣東以及其他沿海地區的成功中獲得實惠的內地省份之間也正在發展。這樣地區間的整體發展有助於防止嫉妒和無節制的政治競爭。

此外，管轄權問題仍然嚴重。任何單位都有否決某一項目的可能，廣東就得進行緊張的政治協調，以便解決那些令外國商人感到頭疼的否決和新聞發佈。廣東也非常需要改進管理訓練，以便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和成本效益。

香港對世界貿易市場的了解、企業家的能力及其與國際技術的聯繫，加上廣東勞動力和參與世界經濟的熱望，這一聯合將會導致一個令人興奮的時代。

結語

因此，廣東往後依然重任在肩，當然也還存在着廣東人實際上已注意到了的大量其他問題。但是，毫無疑問，現在香港和廣東聯手是非常有活力的夥伴。至於未來，赫爾曼·凱恩(Herman Kahn)用了「並不意外」的預期(“surprise-free” projections)這一短語。中國未來的確有出人意料之事的可能。但是，如果人們看看基本的經濟發展，考慮一下香港方面，其對世界貿易市場的了解、企業家的能力及其與國際技術的聯繫，再考慮一下廣東方面，它可以提供志願勞動力，它有參與世界經濟的熱望，把二者聯合起來考慮，這些力量都會為保持持續的活力發揮作用。

有些人談到飛雁理論(flying geese theory)，意指日本是一隻領頭雁(lead goose)，它後面緊跟着的是四隻「小雁」(四小龍)。說到中國，廣東可能是一隻領頭雁；香港是這領頭

雁的頭。不管你怎麼稱呼它，那裏有了進步的牢固基礎。儘管可能會有些我們難以描述的出人意料的事出現，但是最好的「並不意外」的預期是香港與廣東的聯合，這一聯合將會導致一個令人興奮的時代，這個時代是不會因北京的幾句話而停步不前的。

*本文據傅高義教授1991年4月4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利豐集團講座上所作的講演節譯而成。

小文 譯

傅高義(Ezra Vogel)是研究當代東亞，特別是中國和日本社會動態的著名學者，以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Harvard)一書名噪一時。50年代於衛斯理仁(Wesleyan)大學及哈佛大學攻讀社會學，60年代根據廣泛和翔確的實際調查寫成*Japan's New Middle Class*和*Canton Under Communism*等書；近年出版之專著有*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目前致力於日本海外企業發展的研究。傅氏執教哈佛大學凡二十餘年，曾先後擔任各種遠東課程及研究計劃之負責人，現任該校社會學系福特講座教授。